

明清以来

中原水运

兴衰探索



陈隆文——著



人民
出
版
社

明清以来

中原水运

兴衰探索



陈隆文——著



人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王 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以来中原水运兴衰探索 / 陈隆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01-018590-3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水利史—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3037 号

明清以来中原水运兴衰探索

MINGQING YILAI ZHONGYUAN SHUIYUN XINGSHUAI TANSUO

陈隆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8590-3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献 给：

先师筱苏先生和父亲陈昌远教授

隆文泣叩

序

朱 士 光

隆文教授自 1999 年秋来到古都西安顺利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被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建者之一的史念海先生纳入门下，历经长近五年的刻苦学习钻研，在史先生 2001 年以 90 岁高龄仙逝后，终于不负史先生教诲，于 2003 年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又回到故乡中原大地，在也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市工作，任教于郑州大学。自那时以来，满怀对故乡挚爱之情，秉持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原地区这块作为我中华民族与中华传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热土，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继 2011 年 6 月出版了《郑州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后，最近又完成了由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批准立项的《中原历史地理与考古研究》课题之撰著，再加上即将付梓的本书，短短几年间，他在这一学术领域即推出三项内容丰厚的成果（隆文博士此前在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与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建设方面推出的三部著作另作别论），足见用力之勤与收获之丰！

隆文教授这部新著专论中原地区明清以来水运之兴衰及其原因。通观近年来他在中原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方面先后推出的三项成果，可以明显看出，对于中原地区历史时期之河湖水系变化及由之引发的水环境、水资源变化以及它们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之影响，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如在《郑州历史地理研究》一书中就有专章论及郑州古代水系与湖泊；在已结项

的《中原历史地理与考古研究》课题中，也有专编论及中原古代水环境。内中都对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之黄河、淮河、济水、运河等河流与荣泽、圃田泽等湖泊之变迁作了颇为系统的梳理和深入探研。而本书专论明清以来中原地区水运兴衰及原因，虽只是历史时期中原地区水环境与水资源变化研究的众多问题之一，却有其特有之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即：

其一，以往学者对历史时期中原地区水环境与水资源变迁之社会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黄河与淮河之水患灾害上。这固然十分重要，但水运兴衰的变化也当予以关注；而过去对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却少有研究。实际上，古代中原地区之水路运输并非如民谚“南船北马”所说那般无足称道；恰恰相反，而是对一些王朝之兴衰与一些地区经济社会之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运输方式。隆文教授的这部新著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其二，隆文教授在本书中所论中原地区水运兴衰的时段是时清以来的近六百余年，与现当代径直相接。这一时段，中原地区黄河下游、淮河干流与卫河、唐白河以及大运河、贾鲁河等河道之水运由舟楫相通、繁盛兴旺到近现代逐渐衰落，以致使中原地区之商贸业、金融业以及沿河一些商业城镇，如号称明清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朱仙镇，还有道口镇、北舞渡镇、乌龙集、赊店镇等多座商业集镇之日渐式微；其变化历程之相关的遗迹大多还留存世间，依稀可见。隆文教授在书中对它们间的相互影响之关系，从深层次上揭示出来，自会令读者印象十分深刻，其间之历史教训也将会被人们所深深记取，并对当前之经济社会建设发挥出积极的促进效应。

其三，隆文教授在本书最后一章总结明清中原地区水运兴衰原因方面，既论述了社会动乱与近代交通运输方式变革等政治、军事、经济等人文社会因素方面的间接原因；还揭示了中原地区卫河、贾鲁河、沙颍河、唐白河诸河水量减少，甚至趋于枯竭，导致了水运衰败这一自然因素方面的直接原因。而且两相比较，强调自然因素对于包括中原地区水运在内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漕运和水运兴衰起了决定性作用。分析全面深刻，堪称为是一窺见卓识！其实河流水量减少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黄河下游中原地区，在我国这已是一个全国性问题，且呈日益严峻的发展趋势，值得引起我国各级政府与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注意！因而隆文教授对中原地区明清以来水运兴衰原

因之论析，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实已大大超过他这部新著所论问题之本身范围，而且有重大的警世资政作用！

读了隆文教授这部新著的样稿之后，感触甚多，特择要陈述以上所论；应隆文教授所请以之作序，并藉以与读者诸君共享。

2017年4月28日初稿

5月1日改定

不仅如此,包括在苏南、上海和浙江的江浙地区,二里头文明有江苏江宁点将台,丹徒团山,上海闵行马桥,青浦金山坟,金山查山、亭林,浙江象山县塔山,江山肩头弄等。宁镇地区的点将台、团山遗址所出二里头因素遗物有带按窝的侧装扁足鼎、三足盘、豆、觚等,分别属于点将台文化(或称“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太湖流域的马桥、金山坟、亭林及宁绍平原的塔山和浙西南的肩头弄遗址等地二里头因素遗物均属于马桥文化或其地方类型,器类有盃、觚、觶、三足盘、豆、盆等。发掘者将马桥文化分四段,其一、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三、四段相当于商代前期,而二里头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①。这说明二里头文化很可能是顺颍河而下,再沿淮水向东,然后再越过淮水,进入安徽的江淮地区,再经安徽江淮间越过长江进入宁镇地区和太湖流域,再南传至浙江等地区。以前我们对淮河流域在中国国家产生中的历史地位认识不够。现在看来,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且中国古代早期南北文明的起源及其空间上的扩散和传播都借助了淮河及其支流,如果此推论不误,那么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应重新认识。

第二节 中国早期水运的完整体系: 邗沟、菏水与鸿沟

江淮间的邗沟、商鲁间的菏水与中原腹地的鸿沟水系是春秋战国之际,东亚大陆著名的水运工程。商鲁间的菏水与中原腹地的鸿沟水系早已荡然无存了,只有江淮间的邗沟虽屡有变迁但至今仍发挥着航运功能。在这里,本文试对邗沟、菏水和鸿沟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历史上的价值,试作粗浅探索,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中国水运史的开端往往都以吴王夫差开邗沟为起点。夫差开邗沟之事

^①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1期,第56页。

见于《左传·哀公九年》。《左传·哀公九年》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杨伯峻注曰：“邗城当在今扬州市北，运河西岸。邗江即《水经注》之韩江，吴于邗江旁筑城挖沟，连通长江与淮水，大致自今扬州市南长江北岸起，至今清江市淮水南岸止，今之运河即古邗沟水。”^①《水经注·淮水》也记载了此事：“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②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现代历史地理工作者已基本搞清了春秋邗城的地理位置和邗沟最初的经行路线。郭黎安先生认为，“春秋时的邗城在今扬州市北五里蜀岗上，邗沟在蜀岗下，沟水由城东南的今铁佛寺前屈曲向东至今螺丝桥，再由弯头北上。然后穿越武广（又作武安湖，今邵伯湖）、陆阳（又作淶洋湖，今江都市北境尚有遗迹）二湖之间，注入樊梁湖（今高邮湖）。出湖折向东北，流经博芝、射阳湖（约在今宝应县东，与淮安、建湖、兴化三市县交界处）后，复折向西北，由山阳县末口（今淮安新城北辰坊）入淮。”^③汉魏六朝以后，邗沟的运道屡有变迁，直至宋代，邗沟不仅更名为淮南运河，而且楚州运河大部分河段开始筑堤。原来在江淮之间的运河两岸存在着一系列湖泊，宋以前运河贯湖而过，湖河不分。但邵伯以北地势西高东低，夏季，高宝诸湖承天长以东各河洪水，泛滥东溢；枯水季节又因水量不足而断航。为防止水流下泄，危及湖东农田及提高航道水位，保证枯水期航运，唐代李吉甫曾筑平津堰；宋景德中，李溥任制置江淮等路发运使，感到高邮新开湖水散漫，多风涛，便下令回空东下的漕船在还过泗州时，装载石块输入新开湖中，积为长堤；天圣中，张纶“又筑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邮北，旁锢巨石为大碇，以泄横流”^④，至此，淮南运河的西堤大部分完成。至绍熙五年（1194年），淮东提举陈损之又于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筑运河堤三百六十里，并在堤岸旁开凿了一条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52页。

② （北魏）酈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84页。

③ 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8页。

④ （元）脱脱：《宋史·卷426·张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95页。

新河^①，从此淮南运河始与运西诸湖分离，位置也较古邗沟稍有东移，而今天的里运河正是在宋代运道的基础上形成的^②。邗沟的开凿不仅改造了江淮间的自然环境，而且沟通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对联系我国的南北水运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因此，目前学术界在谈到中国运河或中国水运的肇始时莫不以邗沟为始。

按文献所载，吴王夫差是在鲁哀公九年秋“城邗”的，吴王夫差元年是公元前495年，而鲁哀公元年为公元前494年，以此为标准推测，鲁哀公九年应该是在公元前485年，此时已是春秋末年，距春秋时代结束的公元前476年不过九年的光景，所以说中国水运的起点应在春秋末年应无太大问题。就在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后的第四年——鲁哀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81年，夫差为北上中原与晋侯会盟，继邗沟之后，又在淮河以北的今河南、山东交接地带“阙为深沟”，开挖了一条沟通商鲁间的水运通道。按先师所言，“当时鲁国都于曲阜，宋国都于商丘。宋国本属商人之后，菏水正在其间，故称通沟于商鲁之间。”^③这条商鲁间的运河因是从中原地区东北部的古菏泽分出，并向东注入泗水，连接了今山东一带泗水的中上游地区，故又有菏水之称。其具体路线大体如下：西起今封丘县境内的黄池（今封丘县东约23公里平街），东南流经葵丘（今民权县城）东17.5公里处林七集南黄河故道北岸，在旧考城（今兰考境）东，又东经今定陶、武县到今沛县而注入泗水^④。按照《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载，吴王夫差之所以开凿这条水运通道，是为了完成与鲁哀公、晋定公在黄池的盟会，《左传·哀公十三年》所谓“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即指此而言。吴子与晋侯会盟的黄池，至唐代中叶仍有遗迹可寻，其地在今河南省开封、新乡之间的封丘

①（元）脱脱：《宋史·卷九十七·河渠志七·东南诸水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5页，原文如下：绍熙五年，淮东提举陈损之言：“高邮、楚州之间，陂湖渺漫，茭葭弥漫，宜创立堤堰，以为滂泄，庶几水不至于泛溢，旱不至于乾涸。乞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邮、兴化至盐城县二百四十里，其堤岸傍开一新河，以通舟船。”

② 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25页。

③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④ 刘德岑：《先秦时代运河沿革初探》，《西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第123页。

县境内。故《元和郡县志·卷七》载：“黄池，在（封丘）县七里。鲁哀公十三年，晋侯与吴子争盟于此。”^①《水经注疏·卷七》“黄亭近济”下杨守敬案曰：“杜预曰，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近济水。……《续汉志》平丘有黄池亭。刘昭《注》引《陈留志》，黄亭在封丘。《元和志》，黄池在封丘南七里。在今封丘县西南。”^②先师也指出黄亭是春秋时期吴晋两国相会的黄池的所在地，临近济水，是一个有名的地方。黄池本在今封丘县南七里，其地明代曾经成为黄河河道，今黄河古道遗迹俨然犹在^③。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原在黄河以南的封丘县，现在已位于黄河主河道的北岸了。从现在行政区划来看，封丘县属河南新乡市管辖，可唐代的封丘县却属汴州节度使节制。但不管怎样，吴子与晋侯曾经会盟的黄池位于中原腹地，这是毫无疑问的。

黄池盟会之事不仅见于《左传》，而且其他文献与考古材料中也有记载，因而是极其可信的。《国语·吴语第十九》载：“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仍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依徐元诰所说，阙，穿也。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七里^④。吴王夫差、鲁哀公与晋定公在中原地区即黄池的这次会盟于后代传世青铜器也可得以佐证。辉县出土有赵孟圻壶二器，铭云：“禺（遇）邶王于黄池，为赵孟圻（介），邶王之锡金，以为祠器。”二器皆作于此时。另外山西代县也有出土，汇纂云：“书会于此。”^⑤由此看来，晋吴的黄池盟会，是春秋末年的一件大事，而完成盟会所需这条“阙于商鲁”间的深沟，其作用在于沟通了经由济水、泗水直达中原腹地的水运交通，从此长江之舟可游于黄河。济水是古代黄河下游的一条分流，自荥阳北分河水东流，经今原阳县南，封丘县、兰考县北，东流至今定陶县汇为菏泽，再东北注

①（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

②（北魏）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杨魁宏、杨世燦、杨未冬补注：《水经注疏补·上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76页。

③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④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45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74页。

入巨野泽，出泽得受汶水，又东北流约循今黄河至济南市，以下大致走今小清河入海。泗水则发源于泰山山脉，南流大致走今山东南四湖区经徐州入淮。吴国这条运河就是疏导菏泽水东流至鱼台入泗水，后世称为菏水。这条运河开凿以后，吴国的水师可由淮入泗，由泗入菏，由菏入济，由济入河，到达黄河中游任何一地。这条菏水便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而位于两水交会处的定陶成为“天下之中”的重要都会^①。吴王夫差为开挖这条商鲁间的运河，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越王勾践乘吴师北上之际，“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沂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沂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②此时的吴王夫差不仅被循海而逆入于淮的越军断了归路，而且越王勾践还攻入了姑苏城，缴获了吴王夫差的大舟。吴国的霸业就此衰落。因此，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和沟通商鲁间的菏水都应是其争霸中原政治设计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开凿显示了当时偏居于东南地区的吴人势力对深入中原腹地获得政治独立地位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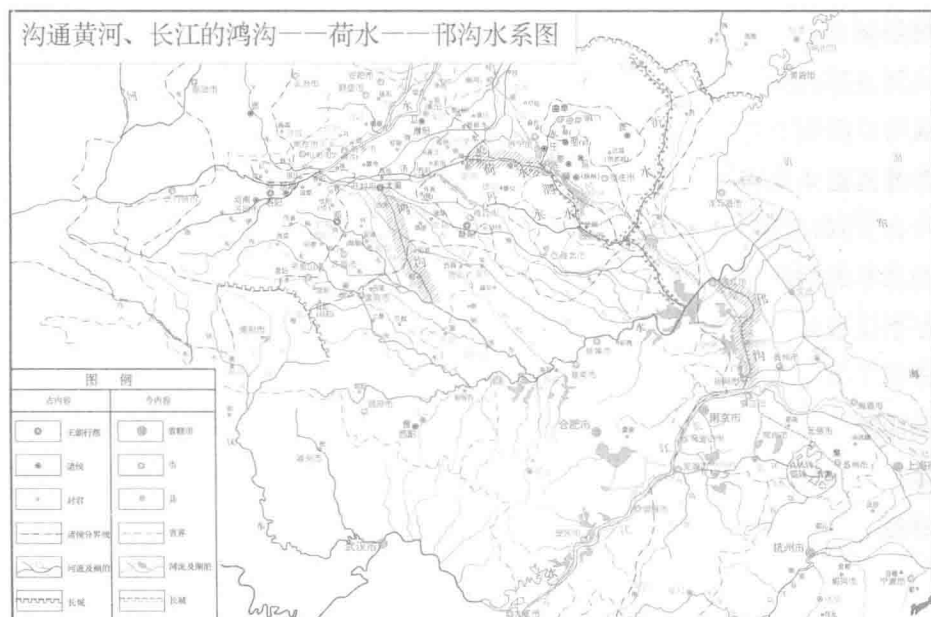
从文献上所见东亚大陆上最早的这两条运河的形成原因和位置关系来看，邗沟与菏水的开凿，前后间隔仅仅只有四年，而且都是缘于吴王夫差争霸中原的政治目的，因此，我们主张考察中国及中原地区水运的起源时，应将邗沟、中原商鲁间菏水的开凿与中原地区古代水运系统——鸿沟水系，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研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固然已远远逸出中原区域范围之外，但它却是吴王夫差北上中原争夺霸主的起点。没有邗沟的开凿欲以问鼎中原的吴国舟师便不能从吴都出发由江入淮，再继而北上，吴人的霸业只能局促于淮水以南而不能深入中原腹地。因此，为完成成为中原的盟主的夙愿。吴王夫差在邗沟完工后的第四年又急急忙忙、不恤民力“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③。而商鲁间菏水的贯通，不仅从地理上沟通了济水与泗水的水运交通，而且泗水向南入淮，这样就又延伸了江淮间邗沟向北的通航里程，

①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8 页。

②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45 页。

③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54 页。

使得邗沟、商鲁间的菏水与中原黄河流域的鸿沟水系联接成为一套完整的水系，而这一套水系沟通了东亚大陆的南北东西。



鸿沟——菏水——邗沟水系图^①

中原地区的鸿沟水直接由黄河中分出，不仅它本身航运畅通，而且还与淮、泗以北、以西的丹水、睢水和涡水等几条水道相连接。鸿沟由大梁南流途中，最北面的丹水（又称汴水）在大梁城北分鸿沟水东流，其上游在今河南商丘市北一段叫作“汴水”，下游经今安徽砀山县北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北入泗，称为“获水”。睢水在今河南旧陈留县西分鸿沟水东南流，经今河南杞、睢二县之北，宁陵、商丘之南，由永城东北南行，经今安徽宿县和江苏睢宁县北，至宿迁县入泗；涡水从今太康县西北分出后，过今亳县北，东南至今睢远县东入淮。由此可见，鸿沟开浚后，将河、济和淮、泗的丹、睢、涡、颍诸水联系在一起，于是在黄淮平原上形成以鸿沟为主干，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完整水道交通网——鸿沟系统。鸿沟凿成以后，北通河

① 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张丽萍制图。

济，南临淮水，并通过巢肥运河、邗沟以达于长江；复经堰渚、胥浦、古江南河和百尺渚，东南抵太湖、东海及钱塘江；沿济水东下经淄济运河可通齐都临淄；由济水北上通过濮水入卫（濮阳）；由济入河，由河入洛，再向西又可远及洛阳。所以《史记·河渠书》有鸿沟“通宋、郑、陈、曹、卫，与济、汝、淮、泗会”的说法。鸿沟作为中原地区航运的主要纽带，与邗沟、菏水、巢肥运河等使我国历史上的运河，开始进入了有体系的时代^①。东亚大陆南北地区的水上交通从此创出了新的格局。这一套完整的水运系统，不仅大大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水运交通条件，而且进一步促进了沿岸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给东亚大陆带来了数以“万亿”计的财富，为不久到来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故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②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原鸿沟水系与邗沟商鲁间菏水的沟通，使得沿岸地区形成了许多繁荣的经济都会，陶（今定陶）即是其中最为著名者。陶在济水与菏水之连接点上，早就被人们称为“天下之中”，成为当时十分富庶的商业中心。春秋末年辅助越王勾践击灭吴国，洗雪会稽之耻的越国大臣范蠡，在辞官后来到陶，变名易姓为朱公，凭借陶“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的有利区位，十九年中三致千金，“陶朱公”也成为富而好行其德者的代称^③。这一套水运系统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于“天下之中一陶的兴起”可见一斑。

总之，邗沟、商鲁间的菏水与鸿沟水系的沟通，不仅促进了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使这一地区在战国至唐末一千二三百年间成为中国北方最发达的经济区，而且加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地区与周边区域，特别是与南方长江中下游之吴、楚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原华夏文化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荆蛮文化加快了融合会通的过程。史念海先生甚至认为鸿沟水系的

① 王育民：《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第120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07页。

③ 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0页。

建成促使了当时人们追求国家统一思想观念的滋生，荀子提出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主张，就是其集中的体现^①。因此，邗沟、商鲁间的菏水与鸿沟水系的联通，使东亚大陆的两河系统——黄河流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当时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国历史上的运河也开始进入到有完整体系的时代，因此，其历史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第三节 水渍遗迹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郑州——开封段古河道

隋唐至宋，东亚大陆太行山以东的黄淮海平原上，存在着一套完整的水运体系。这一套水运体系，以洛阳和开封为中心，包括东北走向的永济渠和东南走向的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而其中的通济渠则贯穿了黄淮平原的腹地，沟通了东亚大陆中部区域的東西往来，其交通价值尤为显著。通济渠在战国时代为鸿沟中的汴水或蕩荡渠，汉魏又称渠水或汴渠，大业元年三月经隋炀帝修整始有通济渠之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郑州北）板渚引河通于淮”^②。也就是说今天洛阳至郑州、开封间的通济渠诸段，不仅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运河系统中的引水枢纽区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由唐入宋，通济渠又兼汴河之名，其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宋人张洎说：“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③汴河成为北宋王朝的生命线和立国根基。此时的通济渠（或汴河）可以分为三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④。而历史上郑州以东、开封以西地区的隋唐大运河正处在通济渠（或

① 陈桥驿：《中国运河开发史》，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41 页。

② 魏徵等：《隋书·炀帝纪》卷三，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63 页。

③ （元）脱脱等撰：《宋史·河渠志》卷九十三，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321 页。

④ 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三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 页。

汴河)中段之尾和东段之首的衔接区域,对于今天的运河申遗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为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了隋唐大运河考古队,于2010—2011年对郑州段大运河沿线进行全面调查,并在工作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在采取传统考古调查、勘探和试掘等手段的基础上,并结合人类学的有关调查方法,对运河沿线文化遗产进行了立体扫描,获取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和民间传说^①。根据顾万发、汪松枝二位先生执笔的《隋唐大运河郑州段调查》一文所载,巩义市洛口仓、郑州市惠济桥段河道和中牟县水渍遗迹等三处遗址成为这次运河调查最新、最重要的收获,而其中的水渍遗迹——我们认为与唐宋时期通济渠(或汴河)故道关系密切,是研究隋唐大运河极具价值的遗产资源。本文试就水渍遗迹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批评指教。

一、水渍遗迹的发现及其文献依据

水渍遗迹位于中牟县官渡镇西北水渍村附近。水渍村属中牟县官渡镇辖下的一个普通行政村,周边地势阔平。该村东北距开封城40余里,西南距中牟县城约10里左右,地理位置处在郑州、开封之间。

2011年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郑州交通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郑汴物流通道工程中,对位于中牟县官渡镇水渍村西北约500米处的一段运河遗迹进行发掘,并对周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勘探。由于地下水位较高,勘探和发掘难度较大,在发掘过程中采取了降水方法,向下发掘至7.5米,发现深灰色淤积层,出土有少量宋元时期的陶片、瓷片等。结合发掘的地层剖面,在周边近30平方公里范围分布着一处呈东西向的沼泽地。而在发掘区以西部分,在勘探中发现一些奇特现象,每间隔三四百米,青灰色淤积土层总会出现约一百米的断档,而这近百米内堆积着较为纯净的黄褐色土层,在这百米土层过后再次出现青灰色淤积土层,这种断档的黄褐色土层

^① 顾万发、汪松枝:《隋唐大运河郑州段调查——洛口仓、惠济桥段河道、水渍等遗迹是这次调查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27日,第四版“发现”。

共发现有三四段。这些现象表明此处应是用于调节水量的大型水利设施，即“水柜”。据当地群众介绍，在发掘区东北部不远处郑开大道与长青路交叉口南部，2007年修建长青路时在西侧取土曾挖出一个带有铁链的铁锚，铁锚出土位置距地表约6~7米，结合该区域地层堆积情况，应属宋元时期。而铁锚的发现也印证这里曾行驶过大型船舶。同时，结合勘探、发掘和文献记载，对中牟段大运河做了详细的调查，并基本搞清其走向^①。发掘者根据勘探过程中地层里出现的“青灰色淤积土层与黄褐色土层”交替存在的“奇特现象”，认为此处“应是用于调节水量的大型水利设施”，即“水柜”的看法，应该说是正确和中肯的，但可能是囿于篇幅所限，发掘者并未对此“奇特现象”和问题作更深入的探讨，殊为可惜。

以水溃遗迹为“调节水量的水柜”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关于通济渠（汴河）上“水柜”的记载见于《宋史·河渠志》，据《宋史·河渠志四》载：“三月，辙又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柜所占顷亩，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柜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八月辛亥，辙又言：‘昨朝旨令都水监差官，具括中牟、管城等县水柜，元浸压者几何，见今积水所占几何，退出顷亩几何。凡退出之地，皆还本主。水占者，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元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所存甚远。然臣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可对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柜，为雨水浸淫，未得耕凿。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柜以来，元未曾取以灌注，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柜，以便失业之民。’十月，遂罢水柜。”^②从文献记载来看，水柜之设主要是充分利用汴河沿岸的湖泊陂塘，以其蓄泄之水来调剂汴渠中的水量，而水柜设置也主要分布在郑州附近汴河渠首和开封以西的中牟、管城两县，这是由于历史上中牟、管城两县存在着大面积的天然湖泊陂塘之故。水柜之设首先由宋用臣创置，水柜之修建大大便利了汴河上的漕运，所以“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取得了

① 顾万发、汪松枝：《隋唐大运河郑州段调查——洛口仓、惠济桥段河道、水溃等遗迹是这次调查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27日，第四版“发现”。

② （元）脱脱等撰：《宋史·河渠志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30页。